

收稿日期:2022-01-12

# 中国共产党对墨家民本思想的延承与超越

靳东超,贺彩,吴文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威海264200)

**摘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家思想体系包含了以重民、恤民、富民为基本内容的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体现了对墨家民本思想的延承。墨家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民本理想内容建构上存在理论盲点,民本理论论证上缺乏论证效力,民本实践依赖上不能找到实践民本的真正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实践民本的制度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现了民本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坚持群众史观,把人民群众作为实践民本的依靠力量,从而实现了对墨家民本思想的超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墨家;民本思想;群众史观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2-001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道民本:中华文明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21FKSB045)。

**作者简介:**靳东超(1997—),男,山东东营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贺彩(1996—),女,山东枣庄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吴文新(1966—),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2.017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探索治国理政方略的智慧结晶,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墨家秉持一种超越阶级的人道主义、救世主义情怀,形成了一系列民本思想,并付诸“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1]18</sup>,作为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践行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弘扬者,在关涉民本议题的理论与实践上,与墨家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与内在的融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历史作用,满足人民的民生需求,实现了对中华文化民本传统的弘扬光大,亦体现了对墨家民本思想的延承。也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得以超越古代墨家的历史局限,将民本的当代形态即人本落到实处。

## 一、墨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探索治国理政方略的智慧结晶,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基于对春秋战国时期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考察,立足平民立场,形成了以重民、恤民、富民为基本内容的民本思想。

### (一)“以民为先”的重民思想

墨家的重民思想体现在对人民之于政权稳定、国家发展重要作用的首肯。“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墨子·七患》)在这里,墨子以作为劳动人民维持其生存给养的粮食五谷为切入点,认为如果百姓的基本生存需要不能得以保障,那么不事生产的君主贵族也会失去生活供给,如果百姓处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生存状态,那么创造国民财富的社会生产便无法进行,国家的发展也会陷入停滞。在这个意义上,百姓与君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甚至平民居于更具基础性、前提性的地位。

墨家的重民思想还体现在其所建构的伦理准则中人民地位的优先性。在墨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中,理想规范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君主“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墨子·兼爱下》)。作为理想化的模范明君,必须做到“民为君先”,先看重万民之身,重视其地位,体恤其生活,得到百姓的认同与赞许,而后成就自身的美名。在百家争鸣时代,人们普遍重视辞令,墨子提出“三表法”并将其作为立言标准,通过向上追溯至古时圣王事迹考察言论的本源,通过“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非命上》)审度言论的信度,通过将其付诸实践以“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检验言论的效度。三条标准中的两条与底层平民大众紧密相关,墨家将“百姓”置于衡量事物客观标准的主体地位,突出其关键作用,强调“百姓耳目之实”可信,“百姓人民之利”重要,彰显着浓厚的重民情怀。

### (二)“爱利百姓”的恤民思想

墨家主张“兼爱”以保障百姓基本生存。墨家呼吁君主重视民生问题,做到体恤民情,倡导“兼相爱,兼相利”这种超越阶级差别的平等的互助互爱,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对此,君主应当“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力图实现“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的美好社会图景。

墨家主张“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墨家“节用”思想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一项主张是社会上工匠们所创制的器物器具“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中》),以此限制统治阶级过度扩张的物质欲望,避免因追求奢侈而造成民力民财的耗费以及物资的浪费。在生产力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民力民财主要用以维持百姓自身及其家庭的基本生存,在这种境况下,如若君王大兴徭役劳役,追逐奢华享受,势必增加底层民众的生活负担,如此不仅无益于社会进步,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墨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提出其“节用”主张,力图实现“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

墨家主张“非攻”以捍卫百姓生命安全。在冷兵器时代,参与战争的主体是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故而战争的沉重代价终究会由百姓承担,百姓是受战争苦难最为深重的社会群体。“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墨子·非攻中》)墨家深刻认识到,发动战争只会给交战双方的百姓带来苦难,其直接后果是剥夺百姓的财用,荒废百姓的利益,危害百姓的生命安全。战争造成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断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也使百姓生活秩序陷

入混乱,战争对农田、水利等生产资料的破坏导致大量农民沦为流民、难民,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 (三)“利民谨厚”的富民思想

墨家主张“富民”,并从天道与国运两个方面对其重要性予以论证。其一,富民符合天道的运行规律。“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墨子·天志上》)墨家认为“生”“富”“治”“义”既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又是天道运行的必然趋向,富民利民不仅关乎治,关乎义,也符合天博大无私、博施众利的本性。其二,富民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代的明君圣主之所以能够称王于天下,正是由于他们做到了“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履,歿世而不卷”(《墨子·节用中》)。富民以利能够有效解决当时民众贫食缺衣、终年辛劳的社会难题,当底层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其德行就会得以教化,变得仁慈驯良,社会秩序安定,国家便得以长治久安、持久发展。

墨家主张“富民”,并从以时生财、分工生财、节流用财三个方面为之提供实践路径。在发展生产、增加百姓财富的实践层面,墨家主张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以时生财。“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统治者要教育百姓遵循务农的自然规律,同时不恣意妄为耽误民时,让百姓按照自然时令规律从事生产,以实现增产增收。二是分工生财。“譬若筑墙,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通过列举筑墙的例子,墨家认为合理的社会职业分工有利于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在职业分工框架内,各人只需辛勤劳动,积极生产,做好分内之事,社会生产的目标就能很快达成,社会生产发展,人民才能得享富足生活。三是节流用财。“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辞过》)只有君王以身作则,做到用财节省,珍惜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不仅在开源的层面富民以利,更需注重在节流层面节俭用财,才能实现百姓富足,财为民用。

## 二、中国共产党对墨家民本思想的延承

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实现了对墨家民本精神的延承。

### (一)从“以民为先”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在墨家民本思想体系中,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与国家稳定的重要作用得以肯定,人民的利益被确立为衡量言论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之一,这都是墨家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作出的贡献之所在。因其立场的人民性,见解的深刻性,内涵的丰富性,墨家民本思想中的先进成分得以由中国共产党人发掘与传承、再现与光大。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坚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厚植于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人民观中”<sup>[2]15</sup>,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彻底遵循,又是对墨家民本思想的去粗取精,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在干事创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人民主体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在实现革命胜利、推进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作用,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8]1031</sup>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进而为经济上改善民生、政治上落实民主

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务实为民,是践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模范先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致力于以真实性、广泛性为特征的“人民当家做主”奠定物质基础,充实思想条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准则,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视为党不可推卸的任务与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强调人民作为发展的实践主体与利益主体的内在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在人民群众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sup>[4]</sup>的人民,“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sup>[5]400</sup>。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锐意进取、扎实苦干,坚持“人民至上”的人民立场,忠实践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续写着新时代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建设篇章。

## (二)从“爱利百姓”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墨家站在“国家人民之大利”的立场,呼吁社会各个阶级“兼相爱,交相利”,尤其强调统治阶级应当保障人民群众饥有所食、寒有所衣、劳有所息,做到体恤民生,爱民谨忠。墨家成员自身也担负起救世济民的使命,周游列国、施教四方,“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古代民本思想家提倡“爱民”“恤民”,并提出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

首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爱利百姓”话语体系的创新。正如毛泽东指出:“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sup>[6]58</sup>可见,剥削阶级所宣扬的对人民之爱是一种有差别、有等级的爱,是一种以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为目的的施舍,是掩盖与强化自身剥削行为而与剥削者作出的必要妥协,这决定了剥削阶级的“爱民”只能浮于表面,统治者不可能做到“全心全意”,被统治者也不可能得享真正的自由与幸福。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模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剥削,人人得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并将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这一整个历史进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民本”向“人本”的话语体系转换。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民”不再是一个与“君”相对应的阶级概念,人民不再隶属于君王,而是作为国家的主人,由专制统治的对象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对象。相比传统民本思想将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共产党则将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以形象的话语表述为“血与肉”的关系,尤其强调党与人民群众应当保持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展和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

此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爱利百姓”的实践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指向,它阐明了实践的对象即“人民”,实践的要求是“全心全意”,实践的内容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务实为民,“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把造福人民的事办好”<sup>[7]1-2</sup>。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升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决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实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为人民造福的统一。

### (三)从“利民谨厚”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仍是一项难题,且统治阶级几乎垄断了对社会的绝对支配,这使墨家认识到社会治理中蕴藏着民生危机,“富民利民”才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长久之计。墨家借助“天志”概念论述了富民对于统治阶级自身以及作为君民统一体的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时生财、分工生财、节流用财等一系列富民主张。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墨家“利民谨厚”思想,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其创造性地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话语表达,并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升至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高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使革命的红利惠及广大农民,让农民获得实在的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以“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sup>[8]662</sup>,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做了科学的概括。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认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sup>[9]154</sup>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中华富民史上的伟大奇迹。在此基础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了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开启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奋斗征程,通过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使中国人民团结劳动的成果更真实、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多层次的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 三、墨家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墨家的民本思想充分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平民的愿望,代表了广大的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和诉求,但是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客观因素存在,其学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 (一)民本理想的内容建构:制度因素缺位

墨家思想包含了丰富的民主主张,但不论是兼爱、尚同,还是非攻、节用,都未触及封建制度基础,未突破既存的制度框架,因而不可能展开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建构,制度因素成为墨家所倡导之民本理想的理论盲区。

墨家自身之局限性决定了其民本内容建构不能触及既存制度框架。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特点决定了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从事农业与小生产手工业,墨子自身就是小生产者的代表,墨家学说的信奉者亦多为“农与工肆之人”,这决定了墨家民本思想代表底层人民利益和诉求的特点,也决定了其自身对统治阶层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墨子把王公大人统治人民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并将其与农夫的“耕稼树艺”劳动、妇女的“纺绩织纴”劳动同等并列来看待,这说明小生产者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墨子及其追随者不能分辨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即底层人民的辛勤劳动,不能辨别劳动者和官僚贵族之间阶级矛盾的根本对立性之本质,故其主张也还达不到通过政治层面的建制以变革社会关系的高度。

墨家对历史趋势的局限性认识决定了其民本内容建构的制度因素缺位。墨家民本思想的建构基于一个前提预设即当前的制度保持不变,并在维护和巩固现有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展开其民本叙事。但是对春秋战国这一大变革时代而言,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结束地方武装分裂割

据的局面,从而实现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实践民本的制度框架得以构建的前提条件还不成熟,因而只有通过兼并战争的方式才能实现这一历史目标,从而为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创造条件,从根本上减少战争,造福苍生黎民。墨家对于历史发展的现实形势缺乏科学预判,一味呼吁社会各阶层之间无差别的“兼爱”,却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无法理性地认识国泰民安赖以实现的制度基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局限凸显了墨家民本思想的主观主义、理想主义的特点。

## (二)民本理论的论证结构:鬼神敬畏与道德说教

墨家的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但在民本问题重要性的论证上却显得乏力,主要依赖人对鬼神的敬畏心理与传统的天人观念,试图对统治阶层的行为施加一种外在的劝导,“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墨子·明鬼》)。墨子及其追随者将“赏贤罚暴”的社会功能赋予鬼神,试图借用人对鬼神的敬畏心理引导社会伦理观念向着利于底层大众的方向变革。古代墨家思想体系虽已形成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墨子及其追随者也心怀抱负,奔走四方,以期将学说付诸实践,然由于其民本思想与统治阶级利益存在冲突,常常引起上层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漠视,对此墨家只得将传统的天人观念引入学说,提出“天志”说,即认为上天掌管天地一切,天是评判王公大人及天下万民言行的客观尺度,人应顺从于天。墨家通过求助于上天、鬼神,试图影响“天子”的思想行为,实践其民本理想。冯友兰先生也认为:“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sup>[10]51</sup>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墨子·法仪》)“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黻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墨子·公孟》)对于实践民本的意义,墨家从古代先贤历史传统的角度展开论证,以“圣王禹汤文武”“暴王桀纣幽厉”为例,从正反两个角度说明君主对民本问题的态度及其对应的结果,揭示了“兼爱天下之百姓”才能兴国安邦以及成就君王自身的美名。但是由于其论证仍局限于道德评判领域,墨家小生产者的立场决定了其对统治阶层的妥协性,未能找到实践民本的依靠力量,也不能突破传统的君臣政治框架,故而墨家民本实践的呼吁也只得止步于道德说教。

## (三)民本实践的依靠力量:统治阶层及少数贤人

墨家将实践民本的愿望寄托于作为王公大人的统治者以及少数贤人,墨子将民本问题与统治阶层的政治合法性联系起来,认为“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使贵为天子”(《墨子·非攻下》),墨家认为“天子”正是首先通过利民谨厚、博施众利才得以成就自己,想要守住江山以及政治地位,必须始终做到重民、恤民、富民,实践民本是“天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亦是其务必珍视与践行的政治使命。在申明“天子”在民本实践中重要地位的同时,墨家认为“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墨子·尚同中》),即百姓的言行举止应力图与天子保持一致。在墨家思想体系中的民本实践活动中,劳动群众实际上处于一种消极地位,即向上与代表“天”的统治阶层妥协以达成一种浅显、脆弱的“尚同”局面,如此,民本实践的主动权全然归于统治阶层,民本实践失却了真正的依靠力量:底层劳动人民。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墨子·辞过》)墨家认为,人们从事劳动生产所需要的船与车,是由贤明的君王指导人们建造的。“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中》)可见,墨家认为粮食得以丰收以及百姓得以获得食物的充足,依赖的不是底层人民创造财富的劳动,而是贤人

的存在以及贤能的发挥。总之,墨家的民本学说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平民的愿望,洋溢着人道主义的救世精神,但是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学说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以从根本上展开理想的民本实践。

#### 四、中国共产党对墨家民本思想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延承、合理性吸收了墨家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突破了墨家历史局限性、阶级狭隘性的民本思想框架,实现了包含墨家思想的中华民本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飞跃和发展。

#####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实践民本的制度基础

春秋战国所处的历史进程,正是私有制逐步扩大其历史影响力的历史阶段,在小农经济主导下,公有制赖以产生的环境与条件仍不成熟,实践民本缺乏坚实的经济制度保障。此外,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体系建构由统治阶层主导,其出发点与落脚点皆为维护其自身及其阶级的特殊利益,“厚民”“爱民”“利民”只能成为“治民”“安民”以维护旧制度的手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团结奋斗,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曲折探索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蕴含着人民本位的价值指向,并将其彰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个具体方面。

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保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多数人占有,使享受按劳分配的劳动者占大多数,促使国民经济在符合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平稳运行与协调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财富创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显著优势。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亿万中国人民得以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有效参与国家治理,在全过程民主的立体民主结构体系中,各种社会力量、各方面利益诉求各得其所,从而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充分彰显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sup>[11]29</sup>这一人民民主的真谛。“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sup>[12]42</sup>是落实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受益主体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不断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作为文化制度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建构与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思想切实关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强调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并通过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将贯彻人本理念、增进人民福祉上升至法的高度,突破了墨家民本思想中制度因素缺位的局限性。

#####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现了民本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

墨家民本思想虽然对规范统治阶级的言行和道德起到了一定的警戒作用,但用虚无的鬼神说教和道德约束来实现政治主张的方式终究经不起时代发展的考验,其“民本思想在根本上重视的是统治者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往往容易走向‘人治’”<sup>[13]18-24</sup>。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归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与光

荣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指导下,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以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围绕民本议题形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成果,并依赖实践将其贯彻落实,进而成功开辟了彰显人民至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机制,推进扶贫脱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向基层农村覆盖,在毫不动摇发展经济的前提下,通过对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百姓在收入水平、就业质量、教育设施、医疗保障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强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sup>[1]12</sup>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sup>[1]22</sup>,将党的宗旨全面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环节和各方面,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思想呈现出更为丰富而鲜活的理论与实践样态,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坚持将民本实践与民本理论统一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反哺理论,实现了对墨家民本思想重理论说教轻实践行的超越。

### (三)坚持群众史观:明确了实践民本的依靠力量

墨家虽然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但始终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在落实民本的实践力量上依赖于王公大人和各级官吏。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局限性决定了墨家没有能力获得“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的正确认识,不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发现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坚持依靠人民实践民本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现实、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活动”<sup>[14]287</sup>。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坚决站在人民立场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所做出的努力,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也依然把人民群众看作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及历史实践的主体,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发挥“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sup>[15]5</sup>,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基础上,开拓崭新的奋斗历程。

坚持群众史观,坚持实践民本事业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就是带领和团结人民为实现自身利益和争取更大利益而奋斗的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实践逻辑中,人民始终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主体,也是国家发展的利益主体。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上鲜明确立、在思想上明确要求、在实践中坚决践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体人民在经济建设、政治发展、文化繁荣、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需要得以不断满足,在建设社会主义与追求美好生活的统一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果、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红利、民本事业建设的福祉得以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 万琦慧.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意蕴[J]. 学理论, 2021(1): 15 - 16.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4]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6]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7] 本报评论员.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论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N]. 陕西日报, 2021-08-06(1).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9] 逢锦聚.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共同富裕百年奋斗的理论与实践[J]. 经济学动态, 2021(5): 8 - 16.
-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13] 马可. 从民惟邦本到以人为本: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6): 18 - 24.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The CPC'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Mohist People-Oriented Thought

JIN Dong-chao, HE Cai, WU Wen-x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Mohist ideological system contains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with the basic content of respecting the people, caring for the people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The CPC has put forward and implemented the idea of adhering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eople,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thus realizing the inheritance of the Mohist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 of Mohist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heoretical blind spo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argument, and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ideal.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PC has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by adhering to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alized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ractice and theor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dhered to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masses, regarding the people as the implementing force, and surpassing the limit of Mohist thought.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hism; people-oriented thought; historical view of the masses

〔责任编辑:朱 根〕